

1701

武汉文史资料

1997年第二辑(总第68辑)



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

1997 年第 2 辑

总第 68 辑



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ISSN1004—1737

CN42—1056/K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邮政编码430014)

主编:萧志华 副主编:殷小琴

特约编审:刘通鸾

责任编辑:吴义隆 武 明

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主办

武汉市政协印刷

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发行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01—30号

2032/4

目录

武汉文史资料

1997年第2辑

·本刊特稿·

- 万里征途进武汉 谢滋群(1)
武汉国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 伍能光(5)
特殊的演出 陈伯华(11)

·名舰寻踪·

- 广州蒙难中的永丰舰 皮明麻 郑自来(17)
风云际会中山舰 皮明麻(26)
中山舰金口喋血记 汪世喜(35)
中山舰探摸工程纪实 王 新(40)
中山舰整体打捞经过 江中联(48)
中山舰陈列金口始末 任永山 张光明(60)
中山舰上抗日阵亡将士墓地寻访记 任永山 张光明(70)
在福州采访三位中山舰幸存者 周国强(75)

·历史回眸·

重炮御敌 彪炳史册

- 记我国第一支重炮兵部队参加“八一三”抗战 鲁 鋈(77)
过雪山 剿残匪 夏治训(83)
建国初期武汉城市路灯建设纪略 王育民(87)
一九五四年武汉防汛抗灾漫忆 费向午(97)
“三反”运动的点滴回忆 冯朝义(106)
“文革”中的一场焚书祸 郑 华(109)
黄陂街忆旧 岱 石(113)

·人物春秋·

著名农业科学家涂治	王东明(122)
早年献身国共合作的范熙壬先生	程 华(136)
京剧名伶赵筱楼	刘辛原(139)
著名楚剧演员关啸彬	刘志斌(145)

·史海钩沉·

中统汉口站站长弃暗投明的经过	朱 彬(151)
赴美接舰回国记	汪世喜(157)
中国驻印军抗日逸闻	王 林(160)

·文苑述零·

对《大刚报》的回顾	王惠超(166)
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鲁迅在香港的演讲稿	胡水清(174)
武汉群众文化馆所的变迁	万生鼎(177)
湖北评书的源流与流派	万生鼎(181)

·工商经纬·

汉口的皮货行业	盛代时(185)
公私合营前后的武汉油饼行	毛炎松(190)
解放前的阳逻港	陶友生(195)
旧汉口的西餐馆及其他	万澄中(199)

万里征途进武汉

谢滋群

翻开 40 多年前的一本本工作笔记，那微微有些发黄的纸页上，用各色墨水写的工作记录，有些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了。然而历历往事，记忆犹新，却如在眼前。记忆的纽带极其清晰地将自己带到那铁马金戈、战火纷飞的年代，带到那中国革命取胜的重要转折关头……

1948 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揭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处于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在此之前，我在内蒙昭乌达盟热北军分区任副政委。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反霸、扩军补充军队，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由于热北军分区有广阔的草原，适宜畜牧，特别是这里的马匹特别多，品种优良。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组织了东北军区骑兵第一师。组织上任命我为这个师的政委。骑兵师的任务是侦察敌情、骚扰敌人，配合野战军行动。如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中，路过锦州以北的沟帮子时，发现国民党军一八四师经义县沿着铁路线向锦州狼狈逃窜，敌人的骡马大板车载满枪支弹药，这

是一个难得的打遭遇战的机会,这时师长问我:“谢政委,怎么办?”我回答:“马上火急报告东北军区司令部。你赶快下命令打,一定将这股匪徒全歼。”命令一下,我们的子弟兵如虎添翼,很快冲了上去,顿时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吓得胆颤心惊,纷纷跪下,双手举枪哀求饶命,只花了三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缴获各种枪支弹药 140 余大车,俘虏敌人 4000 余名。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漂亮,充分发挥了骑兵在平原作战的优势。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们接着又转战义县。由于战斗频繁,极少休息,我患了心脏病,从此不适应骑兵工作,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晋察冀热辽军区供给部任政委,随大军南下。

住在北平时,四野政治部任命我为十五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接受任务,南下上任,当时十五兵团的任务是解放海南岛。自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义师所向,势如破竹,继南京解放之后,武汉也于 5 月 16 日全部解放。我于 1949 年 6 月 6 日抵达武汉,住在汉口黎黄陂路与沿江大道交口的四野招待所内。在汉驻留期间,我看望了武汉军管会主任谭政和副主任陶铸同志。之后,我又去看望了朱涤新同志,朱是我的老战友,在长征途中,我们在一个科内工作,亲密无间,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恳恳交谈,追忆往事,纵议当前,我们亲身体验革命的发展历程,心情非常激动,20 多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这历史性的胜利。

这时,组织上已任命朱涤新同志为武汉市公安总局局长。不几天,他到我的住处回访,并告诉我说:“我已向军管会谭政、陶铸二位主任作了汇报,让你留在武汉,我们在一起工作。谭、陶主任非常同意,我也十分欢迎你,我们一起把武汉这个城市接管好,保卫武汉,建设新武汉……。”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说:“我还是去十五兵团吧!不想脱下军装。”朱涤新同志后来又连续找我谈了三四次,并反复讲了谭政、陶铸二位主任的意见,一定要留我在武汉工作。

领导的希望,战友的重托,我内心是很感动的,但思想也有些矛盾。因我长期在部队工作,参加过长征,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长期的戎马倥偬军事生活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时解放后中国的大局已定,我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南挺进,集中兵力歼灭盘踞在华南的国民党军队,因此,我仍想随部队去打一些歼敌的大胜仗。另一方面,我觉得对地方工作不熟悉,没有经验,怕把工作搞坏了,尤其是武汉这样大的城市,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工作搞不好,则将有负于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我经过反复考虑,仍没有下决心留下来。一天晚饭后,我到街头散步,当走到胜利街德明饭店门口时,恰巧正碰见谭政主任,他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我在延安总政秘书处工作期间,他是我的老领导,对我的情况很了解,相处非常密切。谭主任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在中央党校二部六支部学习期间,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地需要大批干部,我被派到东北军区另行分配工作,当我离开延安时,谭政同志几次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这次在汉口谭政同志见到我,非常高兴,他又问道:“你去市公安局了吗?”我说:“没有去,我还想去海南岛。”他邀我去德明饭店二楼他的办公室,说:“老谢!你就留在武汉吧!武汉是华中重镇,接管城市任务非常重,你是老做保卫工作的,需要你参加接管政权,组织上已决定你留在武汉市公安局工作,和朱涤新同志搭伙。”说着他便亲笔给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写了一封信,任命我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并立即到职工作。

我不好再推辞,只好下定决心,带着谭主任的亲笔介绍信到汉口洞庭街张平化同志的住处,平化同志看过介绍信后,非常亲切地说:“欢迎你,武汉刚解放,大城市情况复杂,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很多,正需要有经验的同志来汉工作,你过去在军队里作过保卫,这很好。我们在一起把这个城市管理好、保卫好、建设好!”

市委介绍我到武汉市公安局后,朱涤新同志接待我说:“你

应早来,现在到职的副局长有徐启文、侯政二位同志;我们在一起工作好了,好好把我们的工作干好。”我说:“大家一起搭伙把工作做好,希望多多帮助我。”

我就是这样留下在武汉工作的,在我的革命生涯中,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弹指一挥间,一晃在武汉市工作 40 余年。在汉几十年中,主要是负责全市的公安、政法工作,长期居于领导岗位,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我的使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后期又任过武汉市人大主任。武汉是座历史名城,我长期工作在这个城市,生活在这个城市,我热爱武汉、更热爱武汉的人民,和武汉的老百姓是有真挚感情的。如今,我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身体状况尚好,年已逾八旬,我要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继续发挥余热,多作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工作,保持一个老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让红军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永放光芒。

谢滋群系武汉市离休老干部,曾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根据谢老口述,刘家谷、施裕文记录整理)

武汉国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

伍 能 光

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是解放初期国内商业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在 1952 年调任武汉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时,全国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已初具雏形。

国营商业的前身,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商业,它规模小,相互分割,而且主要是面向农村市场。解放后全国除台湾省以外各地区连成一片,出现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格局,原来根据地商业那种狭小分散的状况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面对复杂波动的市场关系和大中城市庞大而又集中的商业资本,特别是金融、粮棉等投机资本,国营商业的分散状态使各地的业务活动不能密切配合,统一步调,共同行动,不能充分发挥国营商业领导市场,稳定物价的积极作用。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1950 年 3 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明确宣布全国国营贸易统一归中央贸易部领导,从 1950 年 3 月到 1951 年,中央贸易部陆续建立了 15 个全国性专业总公司,其中属国内商业的专业总公司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盐业、土产、石油、煤建和工业器材共 8 个。全国按行政区划在各大行政区、省、市、专区、县设立了商业厅(局)行政机构和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各总公司对其所属分支公司的全部业务,通过建立贸易金库和商品调拨制度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这些机构既受当地政府领

导,又受上级商业行政机关领导。

武汉市同全国一样,在中央、中南行政区领导下,1949年5月以后相继建立武汉市贸易公司及所属的粮食、百货、盐业、石油、煤炭、信托、零售、土产等专业公司和70多个分支机构。1950年2月又建立武汉市供销合作总社及零售店187个。与此同时,国家花纱布、百货、粮食、茶叶、盐业、煤建、石油、油脂、毛皮、蛋品、猪鬃、畜产、土产、工业器材等公司也在武汉开业,领导和支持武汉市公司业务的开展。武汉市最早的国营商业公司是成立于1949年8月10日的中南区贸易公司所属的武汉市百货公司,次年改为中国百货公司武汉市公司。开始时下设批发、零售商店各一个,职工只有215人。1949年5月,原属官僚资本的中国国货公司武汉分公司,经武汉市军管会接管后改名为武汉市百货公司中心门市部(即现在的中心百货大楼)。为保护生产力,对官僚资本经济机构除改变生产关系外,对职员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凡是愿意继续工作的,一般都安排他们担任原职,企业中的各种制度,也保留了相当一段时期。

武汉国营商业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贯彻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发挥稳定市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的作用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解放初的武汉市场,现在我们记忆犹新,物价狂涨,市场混乱。1949年的5月至7月短短两个月,市场物价由银元和花纱布带头,狂涨了7倍以上,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稳定市场,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政府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如:紧缩货币;强化税收;厉行节约;停止机关、部队不必要的开支;冻结集团购买,通知武汉周围的部队和机关团体暂停来武汉采购物资;开办消费合作社,工资支付以发实物代现金,减少货币流通;国营商业保证人民必需品的市场供应等。同时,一面发动全市人民拒用银元,打击银元投机商,一面大量抛售棉纱等重要商品以平抑物价。那

一段时间,政府通过国营商业从东北地区组织 500 万斤粮食向市场抛售,在此期间抛售的还有食盐几百万斤,棉花几千万斤。组织 200 人的纠察队抓获一大批倒卖银元的投机分子。在强大的政治宣传和各项措施的配合下,物价暴涨的势头得到控制,人民币币值上升,粮食等 12 种重要商品的零售价格下降了 50%。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 1951 年底,先后进行了三个回合,一次又一次地刹住了涨价风,保障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给投机分子以沉重的打击。武汉专做投机买卖的 102 家金银首饰店、33 家纱号、8 家私营保险公司、9 家珠宝商店全部垮台;私营银行、钱庄也垮了一部分,转手批发的盐商也纷纷停业,国营商业由此逐步成长壮大起来,为建立统一的市场奠定了基础。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插曲:由于政府和平抑市场物价中采取紧缩通货,抓紧税收,抛售货物,组织缉私等积极措施,以及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一些私营商业无利可图,要求停业、歇业者增多,1951 年上半年达到一千多户。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当时武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编过一段顺口溜和楹联来表达他们步履维艰的心情。他们说“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还说什么:“张罗货先进,伍月定能光”。把我和当时的税局长张先进同志也编了进去,作为他们要求减轻税赋以图发展的希望。

有鉴于此,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放它一马”。武汉市政府也作出相应决定:“国家贸易机关在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的批发业务上,应占有较大比重”。“在零售业务上,只经营粮、盐、煤、油、纱布、煤油等 6 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以稳定零售价格为标准。各代销店则逐渐缩小,以至取消”。所以,1950 年全市社

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国营只占4%,合作社占3.7%,私营占了绝大部分,为92.3%。市场又出现了工业产量增加,私营商业增加,社会商品零售额增加的新转机。

平抑市场物价几个回合的较量说明,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经济命脉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我于1954年调任中共武汉市委财贸部部长,1955年又任武汉市人委第五办公室即财粮贸办公室主任。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首先是掌握批发环节。因为,批发是商品流通的枢纽,是联接城乡、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只有掌握批发,才能有效地进行商品的组织、调运、储存和吞吐,特别是对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来说,更有其重要意义。由于党和政府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私营批发阵地日益缩小,国营专业公司所属批发经营单位不断发展壮大。武汉市百货公司不仅增加了第二、三批发部,1952年还成立了武汉市百货采购供应站。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更明确地采取了由国营商业代替资本主义大批发商的措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商业基本掌握了粮食、油料、牲猪、棉纱、棉布等重要商品的市场,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在这方面的经营。对为数众多的中小批发商,则纳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范畴,采取“留、转、包”等不同方式,先于私营零售商逐步进行了改造。“留”就是保留一部分批发商,由国营商业委托他们代理批发,取消他们从生产工厂直接采购的职能;“转”是引导一部分批发商把资金和人员转向经营其他行业;“包”是把原从事批发的人员包下来,由国家安排从事批发或其他工作。对于行商和居间性批发商也采取逐步代替、淘汰的办法,到1955年底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已基本完成。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全部完成以后,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从此,商业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协调城乡国(营)合(供销合作社)和省市之间的商业购销关系,商业内部

又进行了多次经营分工和地域的划分,最后形成了市管批发(带大零售商场),区管零售;县管批发,乡管零售(乡、即供销社负责农村零售市场供应);同一城市省管大厂产品收购(省二级采购供应站设在武汉市),市管中小工厂产品收购,这样一种地区分工与商品分工相结合的从上到下“一、二、三、零”的商品流通体。所谓“一、二、三、零”,就是中央商业部在商品产地如京、津、沪、穗设一级采购供应站,省商业厅在省会城市设二级采购供应站,市(县)设三级采购供应站,三级站以下是零售企业。武汉市各国营专业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属于三级批发站,由于它部分地承担了地产品收购任务,它又同时具有二级批发站按计划收购和分配商品的职能。湖北、武汉国营商业专业公司的市场分工:省主要负责全省农村市场,武汉市主要负责市内市场。在市区关系上实行“条条核算,块块监督,集中领导,分散管理”,这是指属区管辖的零售企业,党政干部的管理在区,业务财务核算在市,直到1985年,属市公司与区商业行政双重领导的零售企业,人财物、党政工团全部划交区统一领导。

由于武汉特有的地理优势和交通条件,为了避免商品的迂回运输,减少流通费用,从1955年起,湖北省将邻近武汉的武昌、汉阳、黄陂、孝感等16个县46个供销社划归武汉市供应。1975年省公司又将由市公司收购的产品中的计划商品,由武汉市对湖北省内52个县和107个区供销社直接调拨供应。至此,商品流通渠道方告理顺、定型,并且一定多年未变。

再说商品沿着这条严密分工的渠道进行管理、分配和流通。国家在调整、理顺国合商业内部关系的同时,对商品的管理和分配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958年,根据商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划为三类实行分级管理。一类商品有棉花、棉布、粮食、烤烟、食糖、汽油等21种,所有收购、销售、调拨、进口、出口、库存指标全由国家集中管理;二类商品有猪牛羊肉、家禽、烟、酒、铁丝、化肥等

215种,这类商品名为国家管理,实为二级采购供应站管理;三类商品规定可以自由成交,由于这些商品总量不足,国营商业也将它纳入了二、三级站的分配轨道。武汉市就把防汛物资、重要工业原料、农业生产资料,如一、二级站不管的洋镐把、土松香等一批商品定为三类主要商品,按二类商品的办法管理。这些商品主要通过一年两次全国性的供货会议,进行计划商品的分配和非计划商品的看样订货,合同成交,按合同调拨供应。具体程序是:一、二类商品由国家一级采购供应站按统一平衡的计划调拨给湖北省二级采购供应站,省二级采购供应站按计划调拨给武汉三级采购供应站,市三级采购供应站再平衡后调拨给市内和近郊的零售商店、县公司和供销社,然后由零售店供应到消费者手中。大城市的大型零售商场,经批准也可以直接向一、二、三级采购供应站挂勾,参与分配计划商品和采购自由成交的三类商品。50年代,武汉中心百货商店一家获准参加,60年代由武汉商场取代(一般是一市一店)。这一规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取消。

建国后,国营商业经过多次分工、调整、上收、下放、划细、合并等变迁,至1978年,武汉市已形成一商、二商、粮食、供销四大系统,拥有34个大专业公司,3953个经营门点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体系。

伍能光生前长期主管武汉市财贸工作,先后曾任市财贸办公室主任、市委财贸部部长、市委书记、副市长等职

(李文禧整理)

特 殊 的 演 出

陈伯华

1953年11月,我接到中央有关部门通知,让我率团赴朝鲜慰问。赴朝前,我在北京又一次演出了《宇宙锋》。演出结束后,后台突然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浓厚的湘音:“我晓得她会演得这么好的嘛!”原来是贺老总来了,他唇上留着浓重的黑须,穿着一套中山服,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唱得好啊!到朝鲜去唱给战士们听,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次赴朝慰问团的总团长就是贺龙同志,梅兰芳是副总团长,我任三分团的副团长。

不久,我们穿上军装,在沈阳作了短暂的停留后便乘火车越过了鸭绿江。当我们一踏上这片热土,立刻感到了战争的气氛。对于朝鲜,小时候我就听说过种种神话般的传说,那里山青水秀,森林茂密,大地上盛开着鲜花。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尤其是妇女穿了那飘逸鲜艳的长裙,一歌舞起来就和舞台上的仙女一样。可是如今美帝国主义者正在蹂躏、毁坏这么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慨,恨不得马上能够飞到那些抗击侵略者的英雄身边,对我们最可爱的人作最诚挚亲切的慰问。

列车在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小站上停了下来,车窗外响起了热闹的人声,这是志愿军战士在欢迎我们,朝鲜的老百姓也自发地围了上来,他们站在瓦砾断壁之中,迎着寒风不断地鼓掌。汽车尚未停稳,大家就高兴地跳下。我们被热情的战士团团围住,他们争先恐后地为我们拿行李,把大家簇拥着走向军用卡车。卡车载着

我们顶风斗雪在弹坑满目的山路上急剧颠簸,过了几个小时,在一个不起眼的大山沟里停下,这就是志愿军战士的驻地。虽然这儿弹痕累累,一片苍凉,但战士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就象在家里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我们的住地是大山洞,洞内很黑很小,但大家挤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稍事休息后,我们就向驻地首长提出立即进行慰问演出的要求,首长关切地劝我们第二天再演。我说:“太阳还没落山,可以赶着演一场。”首长苦笑了一下说:“现在的太阳一丝暖气也没有了,西边又爬起了云层,不一会有暴风雪。”我们不信,首长拗不过我们的强烈要求,只好通知战士们在广场集合。所谓广场,其实不过是冰雪覆盖的两山之间的旷野而已。为了迎接慰问团,战士们破冰取土,垒起了一座小土台,两边安上几根柱子,再挂起简陋的幕布,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不久,我们就开演了。

说也怪,正如首长预料的那样,朝鲜的严冬白天很短,转眼间太阳便落山了,沉重的山影携着刺骨的阵阵寒气,暴风雪果然接踵而来。尽管大家都穿着厚实的棉袄,但仍象披着一件羽纱似的寒冷。我们的手冻僵,脸冻得发麻,额前“小水片子”贴到脸上就结成冰,而贴直条大鬓的“大水片”时,脸冻得发裂流血。虽然恶劣的气候如此咄咄逼人,可演员们在台上做戏还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该轮着我上场了。我有一个习惯,一向只穿单衣着戏装,要是套上了毛衣,就象被绳子捆住手脚,什么都施展不开。于是我便将战士们披在自己身上的军棉大衣一脱上了台。天气的确冷,据说是-40℃。我演的是《玉堂春》,开始并没感到特别的冷,然而演到“三堂会审”时,跪在台上干唱十来分钟,我就领略到了朝鲜冬夜严寒的凛冽。首长为了使我们的战士不受风雪的攻击,命令战士在舞台的四周围上了帆布,又在台上点燃几盆炭火,但这依然无济于事。不仅帆布被吹得象海上的风帆,那炭火竟也只见飘着几束红黄火苗,象是凝固冻结了似了,没有一丝儿热气,台板上的寒冰更是彻骨的